

Reader

培文读本丛书

城市文化读本

汪民安 陈永国 马海良 主编



The City Culture Studies:
A Read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912.81/32

2008

The City Culture Studies: A Reader

城市文化读本

汪民安 陈永国 马海良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文化读本 / 汪民安, 陈永国, 马海良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
(培文读本丛书)

ISBN 978-7-301-12651-6

I. 城… II. ①汪…②陈…③马… III. 城市—文化—研究—文集 IV. C912.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9946 号

书 名: 城市文化读本

著作责任者: 汪民安 陈永国 马海良 主编

丛书策划: 高秀芹 于海冰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651-6/G · 216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pw@pup.pku.edu.cn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印刷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7.25 印张 472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如何体验和研究城市？

这本研究城市的书，与其说表明了城市研究的可能性，不如说表明了城市研究的不可能性——城市是如此之复杂和多面，以至于一种观点，一篇论文，或者一本书，根本无法将城市的奥秘穷尽，它们最多只是打开了城市的一个窗口。没有哪个学科领域像城市研究这样没有统一的见解了。我们只能说，城市，只能依赖于城市考察者的特殊目光才能现身。问题是，城市包罗万象，而且千变万化——城市的复杂性足以让它成为一个迷宫一样的魔幻世界。而城市各个不同的观察者，在这个复杂世界中到底能看到什么？每个人的位置不同，立场不同，时代不同，注定了他感知城市的方式不同，他看到的只是城市的偏僻一隅。就此而言，城市，只是构成一个松散的问题场域，它既不可能有一套完善而固定的研究方法，也不可能有一套完善而固定的成见——自然，本书中有一些篇章相互呼应（它们存在着共同的问题，有共同的理论背景，有近似的观看城市的眼光），但另一些篇章则彼此毫无关联，它们好像从天而降，却又毫无理由地插到另外一些篇章中去，在书中显得突兀而莽撞。事实上，这本书中每个人的观点针锋相对，或者毫不相关，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因为城市（有多少城市！）展现出无数张迥异的面孔——如果是这样，如果城市如此之多面，一种趋之若鹜的时髦的城市研究，在什么意义上能够获得它的学科合法性？

事实上，与其说城市构成一个问题场域，还不如说，城市研究集中体现了人们对于城市的兴趣——也许正是对城市，更准确地说，对一个光怪陆离的迷宫一般的城市的迷恋，才是城市研究唯一的共同点。确实，城市丰富、复杂、拥挤、多样、绚烂、玄妙，既秩序井然，又混乱不堪；既可能是欲望的挥霍天堂，也可能是命运的凶险劫数。城市，人们只能说，是个人在其中驾舟的一个大海，个人不可能不体会到大海超出他想象和能力的神奇。对这样一个令他无法回避的，而且眩晕的城市，他不可能无动于衷——或许，这就是人们迷恋城市的基本原因。人们必须将目光投

射到他置身于其中的城市中来。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人们越来越多地卷入到城市中，人们的个人经验越来越受到城市的锻造，对于城市本身的兴趣就会越来越强烈。1800年，只有3%的人口生活在城市，1900年，有14%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在今天，城市聚集了全球的一半人口。问题是，城市化没有完结的一天，它无休无止——无论是全球范围内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化过程，还是一个单一的城市本身的自我变化。这种不停息的城市变化，像一个怪兽一样，将所有人卷入其中，但没有人能驾驭得住——但是人们试图在理论上来驾驭它。实践中驾驭它是徒劳的，理论上描写它却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研究就是对于城市这一令人着迷的，但又无法驾驭的东西所作的权宜之计的叙事。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些叙事，以及叙事的动力，自然地将城市推到了今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醒目的位置上——人们不可能对一个活生生的，而且是难以控制的历史事实袖手旁观，同样，人们更不可能对一个正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事实无动于衷。

事实上，自从19世纪出现了巴黎和伦敦这样的现代意义的大都市以来，人们就开始发现，城市，激发了人们从未有过的想象力，并且赋予人们新的知觉，仿佛一种新的人出现了。一种新的东西，一种新的人，一种从未有过的现代人出现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人，现代性，现代大都市才结合在一起，它们也才出现在福柯—波德莱尔式的联结中。波德莱尔的现代赞歌，就是率先对现代大都市锻造的新经验的抒情回应——这种回应被本雅明敏锐地捕捉到了。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他向波德莱尔表达了敬意，这种表达敬意的方式就是奉献出了自己关于大都市的理论神曲。毫无疑问，在今天，波德莱尔和本雅明先后为巴黎写的抒情史诗成为都市研究最富于启发性的起源和参照。

这是对新的现代城市经验的捕捉。当本雅明站在西美尔（Georg Simmel）的慵懒散文和波德莱尔抒情诗歌之间时，他不得不流露出一种嫁接的忧郁。西美尔打开了本雅明的视野。对于西美尔来说，大都市确实锻造了一种新的个性，西美尔将它称之为新的“精神生活”。波德莱尔—本雅明—西美尔开创了一种城市经验的摸索道路。个人对城市的体验是千差万别的，但是，个人一定会有自己的城市经验。城市经验，始终是城市研究的一个压倒性的话题。我们一再表明，城市繁复而多样，个人只能摸索到城市的片断，只能摸索到自己的城市（德·塞都 [de Certeau] 创造性地将城市看做是一个文本，步行不过是对这个文本的主动但却是精微的语法考究）。将自己在一个特定时空下的城市的摸索经验记载下来，这是探讨城市的方式之一。汽

车如何变成了人的一个身体器官，从而改变人的时空感知？购物空间怎样构造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并让人完全迷失在其中的梦幻世界？咖啡馆和报纸怎样在一个庞大的陌生人群中将一个的共同体聚集起来？酒店大厅内的倘佯姿态如何同大街上的步行姿态相抗衡？城中漫步是白日梦游吗？城市中无处不在的垃圾和气味同人体身上的香水怎样呼应？高层建筑上的远眺能重新解释视觉概念吗？甚至，一个令男人厌恶的街道为什么却可能让一个女人欣喜发狂？人们体会到了城市，有时候这种城市经验让他震惊，有时候让他厌倦，有时候让他狂喜，有时候让他忧郁——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城市也在锻造人的新经验。人和城市的交流经验，既会改变城市，也会改变人本身。说到底，城市并非不是一个锻造工厂。人，他的气质和他的想象，他的语义和他的语法，通常是城市的产品，这是城市文化主义者的信奉，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如此地关注城市的原因。

显然，这些城市经验并非普遍的（这也正是人们所说的城市的微观研究），但并不妨碍它的具体性和确切性。城市的魅力之处，就是人和城市的独一无二的经验遭遇。但是，人们显然不满足于此。这些个人经验确切无疑，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经验？这些经验和个人（气质、禀赋、身体）有关，难道不是也和城市的构造机理有关？巴黎街头的拥吻传统，难道不是得益于19世纪林荫道的扩建？同样，北京街头散步的人锐减，难道不是来自今天汽车马路的大规模扩建？而这种扩建，这种城市的构造难道不是政治经济的产物，不是权力争执的产物？就此，这样千差万别的城市体验，总是和城市的出自政治经济目的的构造有关。问题是，这些城市改造过程中所铸造的新经验，应该获得怎样的评估：它是城市人的福音还是灾祸？或者说，哪些新经验是福音，哪些新经验是灾难？哪些经验对哪些人是福音，而对另一些人是灾难？一种关于城市和城市构造的价值判断，以及因为这种判断而导致的干预性分析就出现了——这是城市的政治经济学考究：城市经验，或者说，城市的文化主义，不可能不是政治经济的产物。在此，人们将城市看做是一个人造机器——城市也确实是个人造物，它并非大自然的天赐。人们对这个人造机器进行了耐心的解剖：它的规划、设计、动能、运转机制、效应等等各项数据指标一应俱全地被披露。城市的整个构造机制本身（我甚至要说，一个城市身体）得到了事无巨细的剖析。人们借此要展示城市身体运转规律，如同一个医生要展示人体的生长规律一样。正是在这里，城市是被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所打量。一旦这个视角摘掉了城市的面具，人们就会发现，城市，它的每个细小角度都刻上了利益的痕迹，表达了阶层的

纷争，巨大而无形的政治经济力量充塞在规模并不大的城市中，使城市内部的枝枝节节缠绕不休，整个城市因而显得饱满、动荡，喧嚣不已。无数的公开的城市研究论文将自己奉献给了城市内部复杂而隐秘的利益战争。就此，城市不得不在批判的目光中受审——这在列斐伏尔（Henri Lefèbvre）以及受他影响的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传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福柯那里，我们甚至看到了城市建造还是对付疾病的机器。在此，构造一个城市区域，仿佛在构造一个战壕。

在此，人们必须承认：城市，是一个理性城市，它必须纳入到生产和消费循环轨道中，必须纳入到治理秩序中，必须纳入到诸种权力的争斗和妥协中。实际上，整个城市社会学传统都采纳了这种政治经济学视角。城市中上演的是权力和利益的无休止的角逐剧，城市的结构面貌是这个剧情的最后效应——我们甚至能看到，城市，有时候同城市之外的政治权力——比如殖民主义——都脱不了干系。事实上，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城市似乎就排斥了个人经验，而展现出各自的独立总体风貌：或者，这是个到处流淌血汗的剥削之城，或者这是一个没有隐私的监视之城，或者，这是一个国际资本疯狂中转的金融之城，或者，这是地产商和政府官员勾结的合谋之城，又或者，这是一个没有中心却又被形象所充斥的后现代之城——所有这些城市并不能被一个恰当的类别所囊括，它们的形象，完全取决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你也可以说，观察者的视角）延伸至何处。

无论是个人对城市的经验，还是城市的复杂的政治经济构造本身，都是从内部来描写城市的。这是对城市身体的解剖。显然，这并非城市研究的全部——还有大量的城市研究从城市内部抽离出来，他们从外部来看待和描写城市——一个（种）城市只有同它之外的东西进行对照才能认清自己的容貌和气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历史主义从城市叙事中脱颖而出：城市是活在历史中的，它有自己的兴衰命运，它的起源和生长充满偶然，它的衰退和消失也常常出人意料。就此，人们有时候试图寻找城市的成长规律——尽管这种规律可能就是没有规律的。也因此，城市必须在历史的链条中，在一个兴衰史中来确定自己的位置，这样，自然的结论就是，一个时代的城市有一个时代的城市容貌——19 世纪的城市是同中世纪的城市的对照中获得自己的容貌的；而今天的城市又是同 19 世纪的城市的对照中自我认知的。不同的时代，会出现不同的城市类型。而城市史，当然会强调城市的断裂，正是借助于断裂，城市以及城市的空间想象才能获得自己的特殊坐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能够理解，巴黎为什么要标明是 19 世纪的都城？——豪斯曼的巴黎同之前的巴黎迥异。上海，为什么应当是张爱玲时期的上海？——这个上海同之后的社会主义上海迥异。我们也能理解，帕克（Robert Park）的芝加哥，为什么只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芝加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样也能看到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城市对照（哈维），现代城市和后现代的城市对照（索亚 [Edward Soja]），工业时代的城市和信息时代的城市对照（卡斯特尔 [Manuel Castells]），地方城市和全球城市的对照（萨森 [Saskia Sassen]），被城墙包围的封闭城市和拆除了城墙的敞开城市的对照（维瑞里欧 [Paul Virilio]），非景观城市和景观城市的对照（德博 [Guy Debord]），甚至是门阀城市和平民城市的对照（韦伯）。这样的城市研究，必须将城市置入一种历史对照的折磨下来进行。人们似乎相信，城市注定会走向它先前的反面状态，而且（似乎是为了让观点表达得更加直截了当）这种反面性要被激烈地强化。这就是城市的蜕变，每个蜕变形象应该被准确地捕捉到——这是从历史的角度，尤其是历史的断裂的角度，来描写城市——尽管这样的描写既不会排除个人的独特城市文化体验，更不会排除政治经济的、冷静的，有时甚至是枯燥的数据分析。

与这种时间对照相关的是，还存在着一种城市类型的对照。比如，在韦伯那里，东方城市类型和欧洲城市类型是如此之不同，以至于导致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东方城市没有锻造出一个市民共同体，因而也没有锻造出一个市民社会。人们也会说，洛杉矶和芝加哥如此之不同，一个是多（非）中心化的，一个是单一中心化的；一个是发散的，一个是聚焦的。这种城市的差异，导致了美国两个城市理论流派（洛杉矶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对抗。但是，城市研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比较视角，还是“城市和乡村”（这是雷蒙·威廉斯一部文学研究著作的书名）这一对立。这构成一个兴旺的城市研究传统，这个城市研究传统多少有点卢梭式的乡愁气质。西美尔谈论城市的腔调，总是隐含着对乡村文化的潜在眷恋，到路易·沃斯（Louis Wirth）这里，这种对照被公开激活了，并被雷德菲尔德（Redfield）所再次挑衅性地激活。由于城市将它的对立面竖立为乡村，那么，城市之间的差异，甚至是城市内部的差异——无论是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差异，还是一个城市自身的历史差异——就可以忽略不计，城市在这里获得了自己的共同属性。似乎只有一个城市，也只有一个乡村。在此，城市通常被看做是现代性的一个载体，甚至有时候，它就是现代性本身。它不单纯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构造和人口聚集地了，它也不再强调自身的某个独特的城市气质了，它甚至也不仅仅当做是一个理性而复杂的城

市机器来看待，相反，城市主要是作为一个文明类型而被看待的，它涉及到人类生活方式的总体：现代社会的决定性要素（无论你怎么评论它）都是在城市中发生的。现代城市的出现，通常被看做是同一个乡村主导的文明的断裂：滕尼斯用共同体（community）和社会（society）来描述乡村和城市这两个不同空间的文化形态；涂尔干则是用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对之进行描述。因此，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实际上埋藏着两种社会形式，或者说两种生活方式的对峙。说到底，什么是城市？城市不过不是自然化的乡村而已。超出乡村及其文化的东西，只能属于城市。城市生活，不能不是对乡村生活的取代和替换。19世纪，现代大都市出现了，乡村开始了它延续至今的衰败历程。在这个“城市—乡村”视角中，城市就是现代性本身。这样一个新的城市生活，它就不仅仅是社会学和人文科学的对象了，它理所当然地还是文学和艺术中绵延不绝的主题。我们听听敏感的诗人们对这种刚刚出现的现代城市所发出的慨叹吧：

啊，朋友！有一种感受，它凭借
独有的权利，属于这个大城市；
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多么常见，
我在人群中前行，对着我自己
说道：“经过我的每个人的
面孔，都是一个谜！”

（华兹华斯：《序曲》，第七章）

或者是，相类似的，是波德莱尔的感叹：

旧巴黎已不复存在（城市的形式，
呵，比人心变得还要快）。

汪民安

2007.10.1

目 录

前 言 如何体验和研究城市?	汪民安	1
一 城市研究：理论和方法		1
从管理主义到企业主义：		
晚期资本主义城市治理的转型	大卫·哈维	2
城市化的权利	昂利·列斐伏尔	14
完美化的分离	盖伊·德博	25
关于后都市的六种话语	爱德华·索亚	31
全球性城市概览	萨斯基亚·萨森	42
作为增长机器的城市：地点的政治经济学	哈维·莫勒奇	49
瓦尔特·本雅明，都市研究与城市生活的叙事	迈克尔·基思	59
方法论：文化、城市和可读性	本·哈莫	77
洛杉矶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欢迎参加辩论	迈克尔·迪尔	96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化进程：分析框架	大卫·哈维	111
二 城市经验与日常生活		121
拱廊计划	瓦尔特·本雅明	122
大都会与精神生活	格奥尔格·西美尔	132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	路易·沃斯	142
城市生活与感官	约翰·厄里	155
城中漫步	米歇尔·德·塞都	164
过度暴露的城市	保罗·维瑞里欧	176
酒店大厅	西格菲尔德·克拉科尔	186

和孩子一起看怪事：城市日常生活	奈格尔·J. 斯里夫特	195
城市与汽车	米米·谢勒尔 约翰·厄里	208
大型购物中心里的世界	玛格丽特·克劳福德	234
城市的垃圾，城市的气息，死尸的气味， 没有臭味的理想城市	伊万·伊里奇	258
现代城市里的梦游者：梦境中的瓦尔特·本雅明与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史蒂夫·皮尔	265
三 城市的文化政治		277
城市的意识形态	曼纽尔·卡斯特尔	278
城市神话与意识形态	昂利·列斐伏尔	288
空间与地位	达夫妮·斯佩恩	295
帝国的边缘：后殖民主义和城市	简·M. 雅各布斯	306
权力的景观：从底特律到迪斯尼世界	沙伦·祖金	315
城市公众空间综览	加里·布里奇 索菲·沃森	329
公共领域反思	理查德·森尼特	339
信息时代的城市文化	曼纽尔·卡斯特尔	347
公共人的堕落	理查德·森尼特	365
四 城市规划与建筑		377
城市规划问题到底怎么了？	莱姆·库哈斯	378
空间与事件	伯纳德·屈米	382
摄影城市规划：从空中到地面规划城市	安东尼·维德勒	387
衰落年代的空间与符号	沙伦·祖金	399
新加坡的版图：波将金式大都市的画像 ——抑或一张白纸的三十年	莱姆·库哈斯	415
城市的发展：一个科研项目的导言	欧内斯特·W. 伯吉斯	420

一 | 城市研究： 理论和方法

从管理主义到企业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城市治理的转型

城市化的权利

完美化的分离

关于后都市的六种话语

全球性城市概览

作为增长机器的城市：地点的政治经济学

瓦尔特·本雅明，都市研究与城市生活的叙事

方法论：文化、城市和可读性

洛杉矶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欢迎参加辩论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化进程：分析框架

从管理主义到企业主义： 晚期资本主义城市治理的转型*

● 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城市治理向企业主义的过渡

1985年在奥尔良召开的学术研讨会，聚集了来自7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8个大城市的学者、商人和决策者。研讨会的任务是探讨：在面临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许多大城市普遍出现的经济滑坡和财政基础被削弱时，城市政府部门可以采取怎样的行动方针。研讨会达成了强烈的共识：城市政府应该更具创新性，更加企业化，应该积极地探索各种各样的途径来改善贫困状况，为市民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会议的唯一分歧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做到最好。在建立新型企业的过程中，市政府是否应该发挥支持作用或更直接的作用？如果是的话，要发挥怎样的作用？市政府是否应该维持，甚或接管那些面临无法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如果是，要维持或接管哪些企业？基础设施、场地、税收，以及文化与社会方面吸引人的项目，能够支撑老企业，吸引新形式的经济活动，政府要做的是否只是为这些活动提供资金和设备？

我以这次研讨会为例，是因为它反映了在过去的20年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城市治理态度上的重新定位。简单地说，20世纪60年代所特有的“管理”方法已经逐步让位于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企业”行为方式。尤其在最近几年，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似乎达成了普遍共识，认为对经济发展采取企业化立场的城市将会获得积极的效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共识似乎跨越了国界，甚至跨越了政党和意识形态的界限。

举例来说，鲍迪 (Boddy, 1984) 和考克雷恩 (Cochrane, 1987) 一致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降，英国地方政府“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与生产和投资直接

* 选自 *The City Cultures Reader*, (ed.) Malcolm Miles, Tim Hall and Lain Border, London and NY: Routledge, 2000。

相关的经济发展活动中来”，而雷斯（Rees）和兰姆伯特（Lambert）则指出，“地方政府怎样受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连续几届中央政府的积极鼓励，在经济领域中采取了越来越多的行动”，以便同时辅助中央政府提高英国工业效率、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连续几年担任设菲尔德劳工委员会领导人的戴维·布兰科特，最近赞扬了一种城市企业主义：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由于政府不再将充分就业作为头等大事，地方议会也开始接受这项挑战。过去对小公司一直有所扶助，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联系也较紧密；并对当地进行大力宣传以吸引新的企业。他们一直在调整英国地方政府在经济领域所扮演的传统角色，如给企业拨款、无息贷款、公开资助基础设施建设、不要求社区相互配合，以便吸引那些正在寻找合适的投资和交易场所的工商企业……面对技术和工业重组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变化，今天的地方政府与过去一样，可以提供独特的企业家精神和进取心。

（Blankett and Jackson, 1987）

在美国，市民振兴主义和企业主义早已是城市系统的一个主要特征。1972 年（在这一年，尼克松总统宣布城市危机已经结束，表明联邦政府不再拨款解决这些危机）以后，联邦政府减少了重新分配的财富量，且地方税收也减少了，这导致了振兴主义的复兴，以至于罗伯特·古德曼（Robert Goodman, 1979）愿意将国家和地方政府描述为“最后的企业家”。现在大量的文献证明：美国城市企业主义已经占据了城市政策制定和城市发展战略的中心舞台。

向企业主义的根本转变还没完成。英国的许多地方政府，尚未对新的压力与可能性做出反应，至少最近是如此，而美国的新奥尔良仍受联邦政府照顾，主要依靠财富的重新分配维持生存。其后果虽然会如实记载下来，但显然会是有得有失的，也会有何为“成功”的争论（我随后再谈这个问题）。然而，在这些纷繁庞杂的现象之后，从城市管理主义向某种形式的企业主义的转变，却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一个不断反复出现的主题。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和这种转变的含义值得我们详查。

当然，人们也达成了一种普遍共识，即这种转变与 1973 年经济衰退以来困扰资本主义经济的难题有关。去工业化、普遍存在的、表面看来是“结构性的”失业、国家与地方紧缩财政，所有这些与新保守主义和对市场理性及私有化愈加强烈的呼吁（虽然更多是在理论上而非实践上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背景，让我们理解何以

这么多的城市政府常常持有不同的政治信仰，拥有不同的法律和政治权力，却选择了大体上类似的方向。强烈呼吁地方政府采取行动解决这些困难，这似乎与民族国家控制多国货币流通的力量逐渐减弱有关，所以，投资采取了国际金融资本与地方政权协商的形式，地方政权会竭尽全力，最大限度地增强地方的吸引力，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城市企业主义的兴起，可能在资本主义从福特—凯恩斯式的资本积累向“弹性积累”的普遍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20年里城市管理形式的转换，我认为有其真实的宏观经济根源和含义。如果珍妮·雅各布斯（Jane Jacobs, 1984）认为“城市只是我们用来理解国家财富是如何创造出来的一个相关单位”这种看法只对了一半，那么从城市管理主义向城市企业主义的转变，对于未来的发展前景则可能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比如，如果城市企业主义（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包含在城市间为了争夺资源、工作、资本而展开的零和（zero-sum）竞争框架中的一部分，那么即使最坚定、最前卫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最终也会发现自己正在玩儿的就是资本主义游戏，他们实施的正是自己试图反抗的那些程序规则。也正是这个问题一直纠缠着英国劳工委员会。他们一方面发展那些能“利用工人技能而不是使其丧失技能而生产出与劳动者的需求直接相关的产品”（Murray, 1983）的项目，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如果城市地区不能获得相对的竞争优势，他们的许多努力都将化为乌有。但是，如果有良好的环境，城市企业主义，甚至城市间的竞争可能为建立一种非零和（non zero-sum）的发展模式开辟一条道路。在以往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这类行为肯定发挥过关键性作用。它是否能在将来引起渐进的社会主义转变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城市治理的其他策略

我在其他地方说过，城市企业主义有四种基本选择。这四种选择综合起来为理解最近在发达资本主义都市系统不均衡发展中出现快速转变提供了线索，而且每种选择都有其合理的因素。

1. 国际劳动分工内的竞争意味着利用特殊优势生产商品和服务。有些优势来自资源基地（石油造成了得克萨斯20世纪70年代的繁荣）或地理位置（加利福尼亚州各个城市都拥有利用环太平洋地区生机勃勃的贸易活动的有利条件）。但是，另外一些优势就需要通过公共或私人投资修建物质性或社会性基础设施创造出来，这些

基础设施加强了以商品和服务出口为主的都市地区的经济基础。直接进行干预，鼓励应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为新企业提供风险资本（这类新企业甚至可能由多方共同拥有和管理），这些或许也很重要，不过，地方上的花费可能会因为有一些补贴而减少（减税、低息贷款、场地等）。现在，几乎所有的大规模发展都离不开地方政府（或组成地方管理部门的各种力量的广泛联合），它提供大量的一揽子援助或鼓励性帮助。国际竞争也取决于地方劳动的质量、数量和价格。当地方集体谈判取代了国家集体谈判、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大型机构，如医院、大学等，在降低实际工资和保险金等事务上起到示范带头作用时（20世纪70年代，巴尔的摩公共机构部门中的关于工资率和保险金的一系列斗争就是典型的例子），地方上的花费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控制。高质量的劳动力，即使很昂贵，也能强烈地吸引新的经济发展，所以在受过高级训练、技术娴熟、适应新的劳动流程和管理要求的劳动力身上进行投资，会得到丰厚的回报。最后一个是都市地区集团经济的问题。商品和服务的生产通常并不是由经济组织单方面的决策来决定的（例如大型多国公司在某个城镇建立分厂，地方性效应和溢出效果通常非常有限），而是由某种方式决定的，凭借这种方式，通过将不同的活动聚合在一个有限的、相互作用的空间之内，以促进形成高效互动的生产体系，从而产生经济制度。根据这一观点，大都市地区，如纽约、洛杉矶、伦敦，以及芝加哥，都拥有一些优势，而没有被过多的成本抵消。不过，正如博洛尼亚的例子和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域突然出现的新的工业发展所表明的，得到地方政府强有力支持的工业与营销组合（在这个例子中，领导者是共产党），可以促进立足于集团经济和有效组织的新型工业区和工业布局的大力发展。

2. 城市地区也可以提高消费空间的竞争地位。这决不仅仅是通过旅游业和养老胜地而为城区吸引资金。1950年以来，城市化的消费主义风尚为人们参与大众消费奠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泛基础。虽然经济衰退、失业，以及高信贷成本降低了一些重要人口阶层参与大众消费的可能性，但是周围依然还存在巨大的消费力（很多是靠赊购刺激的）。当真正有钱的消费者增强了识别力时，与他们的竞争就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以吸引消费者手里的美元为目的的投资，作为对普遍化的经济衰退的反应，正在荒谬地快速增长，而且越来越着眼于生活质量。中产阶级化、文化创新、城市环境在物质方面的提高（包括向后现代建筑风格和城市设计的转变）、吸引消费者的场所（体育场、会议中心与购物中心、游艇停泊港、异国风情的餐厅）和娱乐活动（临时和永久性地成为两种城市的奇观），这些都在城市振兴战略中变得更重要了。

最关键的是，城市要成为一个具有创新的、令人兴奋的、有创造力和安全感的生活、参观、游玩或消费之地。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巴尔的摩被称为“东海岸的肮脏之地”，恶名远扬，经过不到20年的大规模城市重建，从事旅游业的人从不到1000人增加到15000多人。前不久，英国13个处境艰难的工业城市（利兹、布莱德福、曼彻斯特、利物浦、纽卡斯尔、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共同努力进行宣传，获得了英国旅游业的更大份额。《卫报》（*The Guardian*）1987年5月9日这样报道这次相当成功的风险事业：

除了在似乎濒临失业的领域里带来收入、创造工作机会之外，旅游业在更广泛地提高环境质量方面也产生了显著的派生性影响。以吸引更多旅游者为目的的建筑翻新和设施建设也提高了当地人的生活质量，甚至吸引新的企业来此落户。虽然各个城市的具体优势明显各有不同，但每一个城市都能提供许多让人们首先想起使之非同凡响的建筑。换言之，它们都有一种可在市场上销售的东西，叫做工业和/或海洋文化资产。节日和文化活动也同样成为投资活动的重点。“艺术创造了一种乐观的氛围——一种对发展企业文化至关重要的‘无所不能’的文化”，大不列颠艺术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道在引言中如是说，并补充道，文化活动和艺术有助于缓解内城经济停滞而获得发展，同时有助于人们“相信自己，相信他们所生活的社区”。景观和展览成为有活力的社区的标志，共产党人统治的罗马和博洛尼亚与巴尔的摩、格拉斯哥和利物浦在这一点上都大同小异。这样，城市地区便可以期待自己成为具有社区凝聚力的核心，生存下去，同时在四处蔓延的经济衰退的海洋中选择和利用明显的消费方式。

3. 为得到巨额融资、政府或信息收集与处理（包括媒体）等领域的重要控制权，与支配职能部门而展开的剧烈斗争也深深地影响了城市企业工商主义。这些职能需要提供特别的，而且常常是昂贵的基础设施。在关键决策人之间需要进行个人交流的部门，世界范围的通讯网络效率和集中也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要对交通与通信（例如航空港和电信港），以及对备有内部与外部联络系统的充足办公空间进行大力投资，从而将交易时间和费用降至最低。组织大范围的支持性服务，尤其是那些能够快速收集和处理信息或能快速向“专家”咨询的服务，也需要其他类型的投资，而这类活动所需要的特殊技能在提供某些类型的教育（商业和法律学校，高科技生产部门，媒体技术，等等）的都市地区也受到重视。城市之间在这一领域的竞争花